

黃淑娉、龔佩華，《廣東世僕制研究》，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3, 2, 268頁。

中國廣東的地方社會存在著被稱為「細仔」、「細民」、「下戶」和「下夫」等低下階層的社群。這個階層的性質和現象，涉及了中國地方社會性質的爭論。究竟這些低下階層的社群是怎樣形成，他們是否奴隸，出現了眾多對立的意見。黃淑娉和龔佩華基於多年來在廣東省台山縣進行的一連串田野調查撰寫了《廣東世僕制研究》一書，為這研究課題添上一筆。作者把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細仔」、「細民」、「下戶」和「下夫」等歸類為「世僕」，並主張「世僕」是世世代代傳襲的奴僕(頁 158)。此書主要是探討廣東台山縣「世僕」產生的原因，以及其在 20 世紀中葉所發生的變化。

此書的結構分為七個部份。第一部份為研究的緣起，說明作者為何有興趣於廣東「世僕」制度的研究，以及本書的研究問題。第二部份為前人有關廣東「世僕」研究的回顧。這部份是以往國內人類學和歷史學著作中較為缺乏的環節。第三部份為廣東「世僕」的由來。從歷史文獻來探討形成廣東「世僕」的文化根源、「世僕」的地位，以及「世僕」對加予其上壓制的反抗。第四部份則是宗法制度與「世僕」制度的關係。作者主張宗法制度是發展廣東「世僕」制度的重要因素。第五部份是「世僕」的性質。此書以國內外的不同奴隸制度為參照，包括西方的古希臘和羅馬，中國的少數民族的奴隸制度，來探討廣東「世僕」制度是否含有奴隸性質。第六部份為「世僕」的解放。展陳在共產中國成立後，各「世僕」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解放，享受以往所沒有的生活。第七部份為調查報告。作者把其自 90 年代開始在廣東台山所進行的田野調查的部份資料整理成調查報告放在此書篇末，以供各讀者參考。

此書有兩個主要論點，在此我們先談第一項論點。作者主張珠江三角洲一帶稱為「細仔」、「細民」、「下戶」和「下夫」等低下階層的社群皆是「世僕」。這些「世僕」皆不是奴隸(頁 127)，其社會性質應是世世代代傳襲的奴僕(頁 158)，但是作者並沒有給予「世僕」一個清楚的定義。而且，書中有些給作者歸類為「世僕」的人，在當地卻稱為「使使」(頁 247)。這裏顯然需要仔細界定「世僕」的定義。例如，作為「世僕」的是否需要與其「主人」簽訂契約？在作者的田野考察報告中，有些「世僕」是買回來的(頁 254)，有些則否(頁 247)。

作者目的是要為中國的地方社會研究添上一筆。作者在第二章中詳細介紹了中外學者在珠江三角洲所作的有關調查和研究，但是，作者在回應這些研究的觀點之時，態度是比較含糊的。例如頗特(Jack Potter) 在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 Hong Kong Village (頁 19) 認為下夫是類似奴隸的群體 (serflike group)，作者研究所得與該書的觀點有怎樣的對話？作者並沒有說明。由於作者對於「世僕」的定義含糊不清，所以使其論據沒有很強的爭論點。

另一方面，此書的第二項主要的論點就是認為廣東「世僕」制度的形成是受到文化因素和經濟因素兩方面所影響。在文化因素上，廣東「世僕」制度受到整個中國封建文化的影響，與歷代中國封建社會的奴隸制有關，自中原地區傳入的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影響，推動了「世僕」制度的發展。另一方面，廣東地區的經濟發展使到社會產生了經濟地位的差異，宗族內部的兩極分化，以及宗族間的兩極分化使到部份人淪為自己宗族的「世僕」，或成為了其他強宗大族的「世僕」。強調文化和經濟兩方面因素結合產生「世僕」制度，是比較新的觀點。

但是，此書的論證方法出現了數個問題，讓我們先了解此書的推論。此書主張廣東珠江三角洲物產富饒，經濟情況明顯出現兩極分化；加上區內佔主體的廣府民系的宗法家族制度十分典型，因而形成了「世僕」制度(頁 117-118)。為了證明其論點的正確，此書指出在廣東潮汕平原地區，由於土地肥沃，小商品市場繁榮，即使低下階層也可以得到經濟的支持，不須淪落為「世僕」(頁 116)。此外，在廣東梅州和河源地區，由於經濟條件不足，並沒有出現經濟兩極分化，因此也沒有出現了「世僕」制度(頁 117)。由於作者嘗試以廣東其他地區的情況，來突顯台山地區「世僕」制度是當地獨特的社會制度，使人產生很多的疑問。

首先，作者強調地方社會的文化因素和經濟因素是形成「世僕」制度的兩項主要因素，但是此書只著重探討廣東地方社會的文化因素，對於當地的經濟發展卻著墨無多。作者是基於何種資料來支持其說法？

其次，珠江三角洲地域廣闊，地形差異很大，既有丘陵地區，也有沖積平原；區內民系眾多，既有廣府民系，也有客家民系，所以不能視之為單一的個體。沒有仔細考察珠江三角洲各地的差異，卻論證「世僕」制度的出現是由於區內普遍存在經濟兩極分化和宗法制度興盛所致，是否推論得太快？

再其次，作者所研究的地區正正是上述兩項因素有所不足的地區。台山位於珠江三角洲的邊陲，其經濟情況和文化發展皆及不上此三角洲的核心地區。作者承認台山地區中，山區和丘陵地佔全境土地一半以上，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皆有所不足，但是戰亂和自然災害使該地保留了「世僕」制度(頁 61)。那麼，我們便會追問，台山的經濟情況和文化情況是否正好說明經濟兩極分化和宗法

制度並不是廣東「世僕」發展的重要因素？生態因素扮演怎樣的角色？究竟是經濟因素、是文化因素，還是自然災害等生態因素才是廣東「世僕」制度發展的主要動力？正如作者的田野報告所指出，台山美琴村是最窮的村落，但卻是「細仔」最多的村落(頁 244)，但是報告中卻沒有交代當地的宗族條件和生態條件，是甚麼因素使該村擁有大量的「世僕」？再者，作者的論證被其所舉出的例子而削弱。作者指出，潮汕地區宗法家族制發展良好，但是由於經濟條件豐富，不能發展出「世僕」制度；作者同時指出，雖然台山地區經濟條件有所不足，但由於當經歷戰亂和自然災害，「世僕」制度因而得以保留下來。這項論點欠缺說服力。潮汕地區何嘗沒有戰亂、何嘗沒有宗族間械鬥、何嘗沒有自然災害，何嘗不是廣東主要移民原居地？作者並沒有充份證據說明台山地區與潮汕地區在文化和經濟發展上的差別。

在這裏，可以看出作者忽略了歷史時空與地理空間的關係。作者既然強調廣東「世僕」制度是一個歷史的產物，但是並沒有剖析珠江三角洲「世僕」制度的演變過程，並沒有仔細研究珠江三角洲各地的經濟與文化狀況，如何可以推論出珠江三角洲地區在文化上和經濟上皆具有最佳條件，從而發展出「世僕」制度？

作者在田野調查所作的努力是肯定的。由於作者在寫作此書之前已在當地進行了長時期的田野調查，特別是訪問了當時仍健在的曾身為「世僕」的老人，為這些老人的經歷寫下了珍貴的記錄。而且，作者把部份的調查報告收錄在此書的第七章中，為此書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研讀價值。於是讀者自然期望此書會為廣東的「世僕」制度提供了仔細和詳盡的田野調查資料，有助讀者進一步了解這項現象的發展。從此書的編排來看，作者顯然是有上述的企圖。但是，此書並沒有充份達到上述的功能。各調查報告中並沒有交待身為「世僕」的被訪者的「主人」背景和活動。究竟這些擁有「世僕」的人的生活模式是否可以支持作者的論點？這些人與其「世僕」之間的關係和日常生活上的互動又是怎樣？

作者企圖結合歷史資料和田野考察來探討廣東「世僕」制度的發展和演變，這點是值得支持的。結合歷史研究方法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來探討中國社會和歷史課題，已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取向，近年已有不少的著作是基這種研究取向而發展的。此書正好標示近年國內人類學家在這方面的努力。此書也說明了近年國內的研究學者正急速的把國內外的各項相關知識整合。此書嘗試比較國內外的不同奴隸制度，頗值得注意。

在第二方面，由於在此書出版之前，已有一些著作討論了廣東「世僕」的

現象，讀者自然期望此書是超越或補充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之處。但是，其成效卻使人失望。作者並沒有忽略前人的著作，並且在書中以詳盡的篇幅談及前人在這課題的相關研究。在國內這種寫作方式已較以往的著作跨出了一大步，是值得鼓勵的。但是，在補充前人的研究不足之處，作者顯然是未有充份完成任務。

所謂「世僕」是一種社會身份。社會身份必須是存在於社會關係之中，須在各種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才可以展現其性質和特性。所以，研究「世僕」的現象，不能單單研究「世僕」的本身，反應研究作為「世僕」者與當地社區中其他族群和其他社會階層的日常關係和生活上的互動，這樣才能對「世僕」現象多一點了解。

黃永豪
中山大學

未成道男編，《中原と周邊——人類學的フィールドからの視點》，東京：風嚮社，1999，424頁。

本書的題目《中原と周邊》，英譯為“Center and Periphery”，表達的是中國文化的「中心與其周邊」的課題。這本論文集的出版是為了紀念1995年逝世的人類學者王菘興教授。王教授的研究涉及許多方面，包括臺灣漁民、少數民族、以及中日社會的比較研究，他長期在臺灣、香港、和日本執鞭任教，盡心盡力教導後輩研究者。王教授的研究特點著眼於從臺灣、少數民族及日本等中國所謂的「周邊」去理解中國文化。日本社會是「沒有關係，有組織」，中國社會是「有關係，沒有組織」，這一句話是王教授的比較文化研究的精華。本書亦一脈相承，從「周邊」的觀點去理解「中國」及「中國文化」。以下是對本書的一些解說和評論。

本書編者把17篇文章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的10篇文章強調漢民族內部的多元性以及從而開展出來的邊緣性。第二部份包括7篇文章，主要討論遠離中華文化的邊緣社會本身的獨立性及其與中心之間的關係(頁3)。本書副題為「從人類學的田野出發的觀點」，然而，筆者認為各篇文章從人類學的觀點出發，提出了一些嶄新的想法和討論。

在沼崎一郎的〈「家族間企業網」と「家族內企業體」〉和王向華的〈香港の日系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の現地從業員〉，通過日本和台灣、日本和香港的比較，闡釋日本人和漢人的企業形態及經營理念的差異。沼崎認為在漢人的商